

双塔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适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1周年，本版编发相关文章，展现文艺工作者对党的文艺理论实践的探索，《精神航标在 创作活水源》再论赵树理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深远影响；《诗歌大众化岂能走偏》批评文艺大众化中的不良倾向；《观照新农村人物世界》是当下作品坚守人民立场的体现；《告别跟风写作》表明网络文学创作也应遵循党的文艺理论指引，深入生活，为创作打下坚实基础。希望文章对新时代文学工作者改进作风、推出精品有所裨益。

——编者

精神航标在 创作活水源

杨占平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深刻论述文艺和人民群众、文艺和革命斗争、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一篇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指导性文献。人民作家赵树理，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他的文艺创作理念、许多优秀作品，是我们文学界的宝贵财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部分文艺家存在作品脱离群众的倾向、观念自由主义的倾向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多次与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反复交谈，找准问题的实质，发表了这篇《讲话》，目的是要解决文艺领域的问题，希望产生大量优秀的作品。赵树理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优秀作品，很好地实践了《讲话》精神。赵树理自觉选择人民性的写作道路，对广大作家和评论工作者的创作与研究，对当今文学作品的指向性和未来文学的道路，都是非常富有启示性的。

践行理论注重方法

我们学习《讲话》精神，除了要掌握、理解、践行一些核心论断之外，更重要的是落实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立场和文艺表现方法。

第一是立场问题，也就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广大作家为什么要创作？毋庸置疑，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现实生活和我们厚重的历史文化，为作家提供了最丰富、最生动、最多样、最具典型性的创作源泉，这是非常值得表现的。但是具体来说，怎么理解？我们的创作是不是能够发现、正视社会生活的主流现象，给人们以力量和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实生活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是一个悲剧人物，然而，赵树理经过调研之后，进行了艺术的改造，使读者看到在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下，年轻人有光明的未来，那些传统的、落后的文化观念必须消除。赵树理的高明

之处，就是明白了作家应当有的立场。所以，学习《讲话》精神，决不能不解决立场问题就创作。

第二是方法问题。作家创作首先要选择题材，我认为面对各类题材，用什么方法写、会不会准确写是关键。如果处理的方法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或者处理不恰当，那就什么题材也写不下去。比如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是革命历史题材，一般作家写这类题材主要是写战斗的，但他的书里没有多少作战场面，使我们印象深的是农村各种各样的人的生存方式。他写得高明，这就是方法对了。

第三是艺术多样性问题。赵树理不仅仅是继承传统，更有创新意识，他采用与一般作家写法不同的表达方式，让人感到眼前一亮。以赵树理为榜样，作家们在创作当中，既要学习、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也要注意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都应该有。

初心不改为民代言

1949年，赵树理随工作单位进了北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5年的时间里，赵树理有一多半时间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

对于赵树理的农民情结，在时下的一些作家看来，他活得实在是沉重，一位作家只管写你的小说就够了，当什么农民的代言人，管什么农业生产该如何进行，累不累呀！的确，赵树理时刻想着农村政策，想着农业生产，想着农民的利益。按常理，这些事情不是他这位作家必须想的；他却想得那么投入，那么执着，并且要奔走呼号。应当说，这就是赵树理的性格特征。正是这种性格铸就了赵树理的独特人格，也是他能够写出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创造出一个个让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的重要原因。

倾注心血创作精品

今天我们文艺工作者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学习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方法，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文艺观和价值观，创作出让广大读者喜欢阅读的优秀作品。

首先，文艺创作作为大众服务不能计较名利得失。文艺工作者为人民大众服务，是职责。赵树理说，他没有想要登上文坛，自己的作品能进“地摊”、老百姓喜欢看就满足了。他的创作理念是要让普通老百姓可以阅读文艺作品，让大家能够有精神享受。因此，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摒弃得名获利的想法，用优秀作品为人民大众服务。

其次，文艺创作要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公共事务。文艺工作者要努力深入生活，跟群众打成一片，才能获得丰富素材。赵树理的许多经典作品读者很熟悉，这些素材是他长期深入农民群众中得到的。赵树理多次表示，他写的东西是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愿意看。当下老百姓愿意看的是，能够真实反映人们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故事。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就是要及时关注当前的社会问题，这样的观念永远不过时。

再次，文艺创作要有丰富多彩的文体意识。文艺工作者在艺术表现方式上要吸收各种好的手法。赵树理写小说，主要目的是给农民看，他选择了大众化、民族化、通俗化的文体表现方式，自然，农民读者非常喜欢。选择读者可以接受的文体创作，也是当今文艺工作者要特别重视的。

最后，文艺创作者要明确自己的身份。文艺工作者要确立自己是代表人民大众创作的，摆脱个人主义思维。赵树理有三重身份：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农民身份。三个写作身份在赵树理身上得到有机融合，就是因为赵树理有自己的写作主体意识，写农民，为农民写。因此，赵树理对文艺工作者有极大的示范性、榜样性作用，我们都要明确各自的身份，只有这样，在创作中才不会迷失方向。

(作者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

诗歌大众化岂能走偏

黄东成

审美标准多元化，本是促进艺术思想解放、拓展审美空间的好事，没想到竟会成为诗坛乱象的祸因。

爱诗的青年空前增多，这是好事。作为个人行为，诗歌怎么写，都无妨。但口水诗并不是诗，必须分清诗和非诗的界限。虽无统一的明确的标尺，但可以依靠读者的心灵感应。“天上的白云真白/非常非常白”是诗吗？“妈妈做的烙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是诗吗？诗歌语言须含诗性、诗质，即使是朴素的、直白的，也能从中读出诗情、诗意、诗趣。

不久前，看到一篇题为《如何评价新诗大众化》的文章提出：“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要区分大众化和专业化两个问题，二者应当分开来谈，以免陷入片面否定新诗的泥潭中去。”文章认为，谈论大众化的诗歌，要聚焦其社会功能、文化功能；而谈诗的审美问题，则需聚焦专业化的诗歌，关注那些出类拔萃的经典之作。这让我想起早被质疑的小众化、大众化之说。多年前，有文学评论工作者提出“诗是小众化的，诗是贵族的，只有贵族的心灵境界，才能写出具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贵族的心灵境界是什么？为什么大众就不能写出具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事实是，诗坛很多优秀作品均是从大众中产生，都是由无名诗人所写，后来才逐渐知名起来的。

至于说不同标准，“多元化”借口下，各自都是标准，人人都是标准，没有标准成了今天的标准。零门槛，零

审查，零成本，于是网络诗火爆。必须明确，口水、废话不是诗，口水就是口水，废话就是废话，那是非诗的文字垃圾，不可以此来污名“诗歌大众化”。即便所谓的专业化诗，也不可能篇篇经典，仍有高低优劣之分。可见，诗歌大众化、专业化之分，要进行更加明晰的定位和判断。

倡导“我手写我口”，目的就在于促进新诗走向大众，好交流、便沟通，没有古体诗难解典故的障碍。没想到，现在新诗竟也出现隔膜，或不循语法、故弄玄虚，或词语错乱、伊如卦爻。好懂的词语，不好懂的诗句。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审美意味，自己也说不清。

新诗还在寻路，尚未定型，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还会有曲折颠簸。幸有指南针，“走向人民大众”，方向正确，导向得力，新诗必定能健康发展。

人民大众始终是诗歌的主体。诗歌大众化，是中国诗歌的方向。诗人，首先是社会人，思想敏锐，内心张扬，敬畏生活，感恩社会，怀有善心和德行。读诗，读出诗人的精气神，诗便有了魂魄。诗魂，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标准。不论“大众化”还是“专业化”，标准唯此。诗人固然可以有各自的审美趣味，但绝不可以低俗、庸俗、恶俗，那是丢了魂。

文坛一瞥

告别跟风写作

清扬婉兮

当我们打开电脑打算写一个故事，寻找好选题，是首要任务。

网络文学一直都存在题材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一类题材火了，大家一窝蜂去写，因此出现了许多题材分类，如赘婿文、萌宝文、闪婚文、替嫁文等同质化作品，也许短时间内可以蹭到流量的红利，但长此以往，落入窠臼，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会遭市场的反噬和扼制。

好选题如同一块璞玉，创作者就是采玉人，要有火眼金睛。许多人认为火眼金睛是一种天赋，或者认为好选题是灵光乍现，妙手偶得，其实不然，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不是天生就有，是经过火炼烟熏，才淬炼而成。如何练就火眼金睛，在选题时独具慧眼？

摆脱随机创作和跟风创作模式，找到自己的赛道。作者首先要了解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明白自己擅长哪一类题材，能够驾驭哪一类题材。原有的随机创作和跟风创作模式，等同于靠天吃饭，不仅质量不稳定，还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怀疑，得不偿失。

走进人物心里，让人物确定选题。走出书斋，观察生活，这是老生常谈的观点，大家的共识，许多创作者其实都具备基本的选题嗅觉，能够紧扣时代脉搏，从生活中和网络话题里捕捉到当下的热点。但是，仅仅看到这些还不够，要清楚当下，现象不是故事，时代情绪不是故事，事件也不是故事。发现背后的隐喻，提炼主题，确定主旨，才能找到一个故事。事件就像一块包裹着石皮废料的璞玉，一块璞玉到了手里，要雕一尊像，还是做一个手镯，这是个问题。一位创作者，要以艺术的但又符合生活逻辑的手法从事件中挖掘提炼出闪光的东西。我的做法是，假设自己是这个事件的主人公，代入自己后，思考人物的动机是什么，会如何选择，如何推动事件的走向。

好选题如同老面发酵，不要急于求成。把更多心思放在选题的打磨上。收集素材、确定选题、撰写大纲，少则一两月，长则需要一两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即使写好了大纲，我也不会马上动笔写正文，我会先放一放，过几天或一段时间再看看。我把这个过程，叫作面团“发酵”，发酵对水温、气温、时间都有要求，选题也是如此。大纲写好之后，放一段时间，会产生新的想法涌进来，也会有旧观点被去掉，会产生新旧的碰撞和磨合。

古人说“琢磨璞玉，美玉出焉”，作为创作者，在浮躁俗世中，我们更需要这份静气，沉潜下来，从选题入手，打磨好手中的每一部作品。

一家之言



《点点白的俏鞋子》插图 赵静 绘

每天早晨醒来，总有那么一小会儿，会对着屋顶发呆。那呆，很像是一块在阳光下待久了的石头，在上面坐一会儿，屁股热热的，似会绽出笑来。

而现实的声音，也会在某个时刻灌进耳朵，叮零当哪，像谁扔进来的锃亮钢镚儿。

从梦里出来，二羊信的声音竟就进了耳朵了。二羊信的声音在很远的一座村庄，也在那座村庄若干年前的夏天或者冬天、早晨或者黄昏。

二羊信的声音何至于就从远处、从过去来到了耳朵里，真是怪事！

其实怪啥呢？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拥有自己的羊群，一群或者两群，十群或者八群。每个人心的容量总是不同，存放羊群的数量也总是不同。

就像二羊信，一直不知道自己叫啥名字，也不知道人们为啥叫他二羊信，但他有自己的羊群。早晨太阳从东南往正南走的时候，他就赶了羊从村庄往西或者往东、往南或者往北，走进日子。二羊信每天走进日子，时间长了，不像是他在走进日子，而是日子也是一群羊，跟在他的后边，一直走，一直走，走进村子周围的河沟、树林或者绿草丛中。二羊信赶羊的声音很好听，还有调，那是二羊信的调。二羊信的调很多，有小曲儿、北路梆子，还有口哨、咳

咳腔。二羊信的鞭子甩出去，就能把他的这些腔调串起来，就像地上的路把他的羊群串起来一样。

其实二羊信早就不在在了，可是我一直能听到二羊信的声音在每天早晨灌进耳朵。

后来我成了二羊信，我喜欢领着一群发过的呆或者正在发的呆，寻找一片青草，或者寻找一片漂满了枯枝残叶、水虱子、翻片子等东西的水池。我喜欢把那群呆们扔进青草里或者水池。然后躺在阳光下，继续发呆。发呆是我孕育羊群的方式。

有人骂狼的声音、骂屠刀的声音飘来飘去，也有用锉刀或者大锤锉凿的声音撞来撞去，我只听着我的呆们啃食青草的声音、在漂满东西的水池里玩水的声音，慢慢地让又一些呆从我的呆里走出来。

其实于我而言，那些呆们，似乎就是我的文字。我的文字，就是跟在我身后的羊群，我领着它们努力找到水草丰美的地方，但或许找来找去，在它们的眼里看到的只是枯草或者在梦里才能见到的青绿。

是2016年，经山西省作家协会推荐，我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这是一次寻找的过程，或者也是一次出走的经历。是我领着羊群，亦或是我的羊群反过来催催我，我从一片草滩来到另一片草滩，而无论我还是我的羊群，都是为了看到一些惊奇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是在鲁迅文学院的某一天，山西希望出版社的一位领导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写一本书，写一本与儿童有关的书，而我在鲁迅文学院参加的学习班，就是儿童文学高级研修班。

在那一刻，我身后的羊群眼睛亮了起来，它们在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文学馆路一栋六层小楼的房间里彻夜难眠，并望着北京的夜空，听着玉兰花盛开、银杏果落地的声音，听着那棵高大的柿子树上仅剩两个柿子的窃窃私语，发出了只有忘情地咀嚼青草时才能发出的声音。

王松以高产写作为人称道，而更具影响力的，是其坚持不懈的叙事探索精神。最近创作的长篇小说《热雪》(作家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令人加深了这种印象。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围绕土地流转和承包所展开的北方乡村故事。土地的重要性，对于从农耕社会走出来的一代代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由于本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很多人加快了离乡的脚步，进入了“他乡时代”。而家乡是当下的、鲜活的、单纯的、亲近的，如果家乡有发展、收入有提高、生活有保障，一般人还是愿意在家乡生活。

乡村振兴总是发生在家乡的故事，因此只有留住人，特别是留住“能人”，才谈得上乡村振兴。在小说中，赵家坳出能人，中青年一辈脑洞筋活，“眼珠一转一个主意”，把赵家坳建设得“风生水起”；也有外乡人一起参与，成为活跃赵家坳经济发展的骨干分子。《热雪》没有正面或反面人物，不以价值观为界限，人物不具太多的破坏力和伤害性。区别只是新旧之分，偏向于大胆或懦弱，进取或保守，带有农民和小农经济乡土特色，总体可称之为善良、耿直、可爱。

乡村能否留住能人，还要取决于其经济发展前景如何，这是一个互为因果、彼此关联的问题。当今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很复杂，这给《热雪》提供了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丰富内容。《热雪》精妙地把握住中国小农经济传统下农民的种种矛盾心态，通过多种人物关系纠葛与鲜活的细节描写，表达了对时代变迁中农民的经济观、利益观的尊重和理解。他深知土地的命运与农村走向现代化息息相关，在小说中通过这些“能人”围绕土地流转的各种计算、运作和博弈的展示，打开了错综复杂的乡村背景和丰富多彩的人性世界，这一切相互映照，彼此勾连，将读者置身于引人入胜的叙述现场。读者也由此感受到，乡村中的新型人际关系，如何激活了传统农业模式的“熟人社会”，给我们一种启示：小说的历史感未必只有用重大历史事件来表达，把社会生活的当代性和自然情态写出来，就具有见证历史的价值。

驾驭长篇小说，有些作家潜意识里总有欲罢不能的史诗情结，热衷于大制作、大气象，王松显然没有这类考虑，没有刻意凸显深重的历史忧患、痛苦的人性挣扎，不做历史定位和标签，而是深入潜流状生活形态，记录乡村振兴，展示民间烟火，发掘小说美学的愉悦性，尽可能多地提供弥漫在生活故事中的趣味性。以往王松的小说常常表现为一种“重口味”叙事，也可称“强叙述”，属于颇具刺激感和震撼性的传奇书写，下笔狠、着墨浓，且时有“命案”发生。这两年，自《暖夏》到《热雪》，这种“重口味”叙事已是面目全非，注入了许多中国戏曲或曲艺元素，从麻辣刺激到云淡风轻，进入了返璞归真、大味必淡的境界。王松的小说文本不见任何雕琢痕迹，似乎都是些寻常的“规定动作”，语言近乎白描，这需要强大的自信、厚重的经验和娴熟的技巧作支撑。化浓重为平淡，化复杂为单纯，化技巧为无痕，显而易见，这种现实主义书写，永远比刻意“炫技”更有难度。



《热雪》书影

观照新农村人物世界

《热雪》的叙事探索

黄桂元

二羊信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侯建臣

那一段时候，分外晴朗，一缕阳光从云彩里钻出来，另一缕阳光从楼顶上跳出来，而大多数的阳光披着七彩的绸衣，在树枝上跳舞，在玻璃里做鬼脸，在鸽子的脊背上弹吉他，在风的翅膀上荡秋千。还有一些似是娇惯久了的，只就用长长的胳膊吊在太阳的脖子上，也不唱也不跳，懒洋洋地做完了一个梦，再做另一个梦，直到把要做的梦都做完了，再返回来把所有的梦重新做一遍。

是的，我的羊群看着那些阳光，特别是当它们看到一个一个梦从那懒洋洋的阳光孩子的脑海里放电影一样流过的時候，都笑了起来，忍也忍不住，憋也憋不住。

我的羊群开心地笑着，一直笑一直笑，一不小心，它们都走进了一片开阔的青草地，那片草地就是《点点白的俏鞋子》(希望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是的，那是一本关于鞋子的书，是关于一个名字叫“点点白”的太阳女儿的鞋子的书。当然，还有稀哩吧啦星、绿皮车、皮皮风，还有光光亮亮和宇宙世界超超级美声小姐丫头鸭。而那个讨厌的黑暗之魅，则被孤独彻底控制了。孤独可能会毁掉一切，而团结的力量不仅可以助推成长，更能战胜那不可一世的邪恶。

而我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我的羊群们一起做出来的一个游戏。

在某个早晨，当我知道了一个有关文学奖的消息，我的羊群、我的那些羊们正在低着头认真地吃草，我也在让我的一个又一个的呆们从我的梦想中列队而过。

而二羊信赶羊的声音又在我的耳朵里响起。那么遥远，又那么切近！